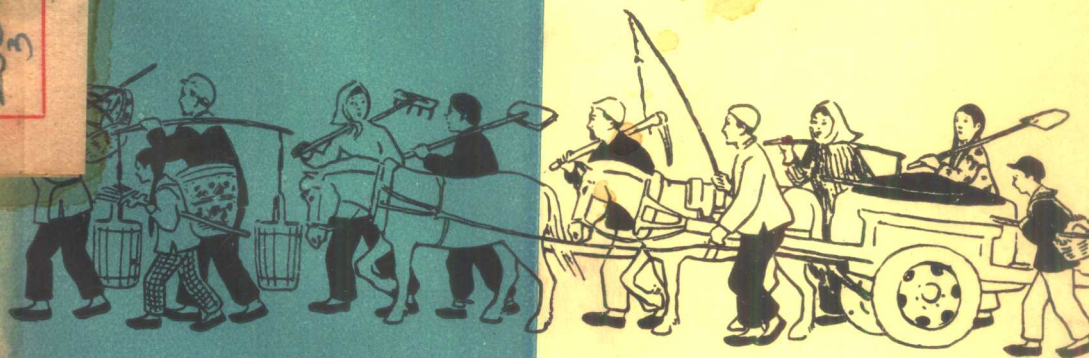


农村跃进之歌

第三輯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2832
3

农 村 跃 进 之 歌

第 三 輯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从这一輯起，我們在編輯工作上作了一些改变。为了使讀者購買方便和出版迅速及时，字数从每輯十几万减少到四、五、六万不等，同时取消了編后記，增加內容說明。以后我們預备繼續这样做。

本輯共八篇，前四篇选自“人民日报”。其中根据河南封丘应举社社长崔希彥同志的报告整理而成的“我們彻底挖掉了穷根”，是特別值得我們仔細一讀的。毛主席在“红旗”第一期上发表的“介紹一个合作社”一文所推荐的就是这个社。后四篇是新稿，它們描写了农村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三过宝丰山”和“跃进花”内容生动，形式活泼，“夜走楊湾村”短小流暢，可以看做是一篇小小說。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914 字数 42,000 开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张 22/7 插頁 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册

定价(5) 0.20元

統一書號：10020·914

定 价： 0.20 元

目 次

我們徹底挖掉了窮根·····	崔希彥 (1)
麥收一日·····	“人民日報”記者集體采寫 (24)
慶豐收 話新事·····	“人民日報”記者集體采寫 (30)
一夜筑成攔河壩·····	石正章 (35)
三過寶豐山·····	李茂榮 (37)
躍進花·····	何 坪 (43)
新農民歌舞在水鄉·····	黎 鏗 (51)
夜走楊灣村·····	朱海濤 (57)

我們徹底挖掉了窮根

崔希彥

我們應舉農業社的土地不好，不光地形低洼，還都是鹽鹼地，在解放以前是“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上千畝土地經常顆粒不收。就是在豐收年，每畝最高產量也只有五、六十斤，許多人缺吃少穿，逃荒要飯。1942年，因遭受自然災害，全村一百三十五戶，有四十戶逃荒，三十七戶要飯，七戶賣兒女。當時，在群眾中流傳着“春季起地一季忙，夏季播種心發慌，秋季水淹青變黃，冬季受災一片淒涼”、“春夏秋三季一頭汗，到了冬季去要飯”的歌謠。

自從1955年合作化以來，我們經過二年多的艱苦奮鬥，已經徹底挖掉了災根，消滅了貧困，特別是戰勝了1957年嚴重澇災。1957年，水淹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94%，是解放以來受災最嚴重的一年；可是，也就在這一年，我們社根除了自然災害，摘掉了災區帽子，最高的畝產量到達五百斤，平均每畝一百五十斤，加上開展了一些副業生產，這就使我們社不僅消滅了災荒，而且成了餘糧社。全社90%以上的戶超過了富裕中農的生活水平。去年春節，家家戶戶吃上了白饅頭、豬肉、餃子，大大改善了社員生活；同時，農業社內還進行了基本建設。群眾歡欣鼓舞地歌唱：“瓜兒離不了秧，孩兒離不了娘，窮人離不了共產黨”，“農業合作化，集體力量大，災年過春節，賽過豐收年”。

現在，我們應舉農業社已經變成狂風暴雨吹不散，石砸不破、鉄打不爛的堅實組織。

苦战三五年，豫北变江南

1957年遭受严重的涝灾以后，我們社的党支部及时提出了行动口号：不貸款，不破产，保証自給三不叫（猪不叫，人不叫，牛不叫）。口号提出来以后，除搶种、补种晚秋作物外，主要是开展副业生产。我們开展副业生产有个原則，这个原則就是不做投机倒把生意，不依靠国家貸款，依靠自己的技术，依靠自己的工具和原料，自力更生，战胜灾荒。为啥这样說呢？国家利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利益、社員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利益受損失，就是合作社利益受損失，也是社員个人利益受損失，这是搞副业生产指导思想上一个很重要的問題。

就憑这个原則，我們不做对于国家不利的事，比如我們社里去年生产的紅花（紅花是封丘县的特产，是藥材），国家收購牌价是四元三角八分一斤，私商为了搶購紅花，竟抬高到十元到十一元一斤，部分社員說：“卖給私商吧！”社党支部和社管理委员会坚持不卖給私商，还把私商批評了一頓。再如去年秋季，我們社加工粉条三万斤，国家收購牌价是二角七分一斤，私商又抬高到一元一角一斤，当时如果真卖給私商，三万斤粉条，就可以卖到三万元，但是，我們坚持服从整体利益，三万斤粉条，全卖給了国家，沒有卖給私商一两。

搞了副业生产，确实是救了1957年的灾，但是，我們社党支部考虑到：今年受灾今年救，明年受灾明年救，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挖掉灾根呀！正在作难的时候，中共河南省委提出了在灾区贯彻“防重于救”的方針，号召灾区兴修水利，改种稻田，搞些农业基本建設，从根本上消灭灾荒。这个方针对我們社里干部和群众鼓舞很大，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方針接受不了。有的干部說：重灾区年年以搞

救灾为中心，可是今年防重于救，群众生活还救不了，那有劲头去搞防灾？有的群众说：几辈子没听说我们这里的地可以种水稻，这不是跃进，是冒进。我们就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年年受灾好，还是摘掉灾区帽子好？年年苦熬好，还是现在苦战好？灾区是不是能够实现四五八？如何实现四五八？在辩论当中，社党支部发动群众算了一笔账：1956年以前，由于对生产自救方针贯彻得不好，国家发出许多救济款，这还不够，我们又向国家贷款四万七千元，这样，不仅影响国家建设，合作社负了债，而且第二年仍然遭了灾。一辩论，大家明白了，都说：今年受灾今年救，明年受灾明年救，救了七、八十年，越救越穷，救灾是个消极办法，一定要防灾，只有防灾，才能彻底摘掉灾区帽子，彻底挖掉穷根，很快走上富裕的道路。大家思想上通了，可是咋防法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有了目标，没有具体道道也不行哪！这时又有人说：“防灾是好呀！就是没办法，没经验哪！”社党支部又发动大家讨论了。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要根治水旱灾害，就要兴修水利，光兴修水利没有用，还要改良土壤，搞积肥，才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思想通了，道道有了，社党支部及时提出了行动口号：“苦战三、五年，豫北变江南，盐碱洼地变稻田，吃大米吃鱼不作难，幸福生活万万年，共产党领导万万年”。“麦前实现水利化，今年过黄河，明年过长江，变年年受灾为季季丰收，永远摘掉灾区帽子”。在方法上，我们确定了从防处着眼，从救处着手，以防灾带动救灾，以救灾推动防灾。在防灾救灾相结合的原则下，搞好全面跃进工作。

群众一经发动起来以后，你不叫他有劲，他也要有劲呀！这时，正好冬天来了，天寒地冻，冷风一直刺到人的骨髓里，有的社员的手冻肿了，裂口了，还要干。有一个叫崔福珍的社员，手冻肿了，我见了

說：“你休息吧！”他說：“不休息，寧願苦戰，不願苦熬！”這說明：黨的方針、政策總是代表廣大群眾的利益，方針、政策只要能夠為群眾掌握住，就能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當我們認真說明防重於救的好處以後，群眾認識到執行這一方針，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所以在那樣冷的天氣，大家唱着歌勞動：“一股勁，齊向前，修渠道，改稻田，保丰收，滅災害，好生活，萬萬年。”群眾還說：“天再凍，凍不了我們勞動人民的双手，天再冷，冷不了我們勞動人民火熱的心。”就是這種沖天干劲，掀起了三大高潮。哪三大高潮？水利建設高潮、積肥高潮和生產救災高潮。這三大高潮掀起來以後，在短短幾個月當中，就取得了很大成績。在水利方面，陰曆年底就實現水利化了；在積肥方面，每畝積肥達三萬斤，超過以往四倍到十三倍；農業生產上，搶種、補種了晚秋作物，獲得了水淹地的豐收，收入一萬二千三百元。同時開展了副業生產，又收入一萬多元，兩項加起來，共收入三萬多元，超額完成了救災任務。

查查算算做規劃

從去冬今春，全面大躍進以來，農村工作是：項目多，任務大，力量小，時間短。在這種新情況下，如果不全面規劃，工作起來，就會陷於被動。所以必須全面規劃，統籌安排，特別是勞力規劃，是個大問題，做好勞力規劃的辦法，首先是通過查算，就是查查任務，再算算時間，一項一項任務規劃出一定的時間，然後看看社裡有多大力量，多少勞力？多少畜力？通過查查算算，就根據任務確定力量。大躍進前，我們社可不是這樣的，那時是根據力量，確定任務，現在看起來，根據力量，確定任務是個消極辦法，不能發揮勞力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鑽研性。為啥呢？比如挖河吧！你給五方土的任务，他就只想挖

五方土，不想多挖了，他不肯動腦筋了。因此是消極的，不適於全面躍進的形勢。現在，我們是根據任務，確定力量，如救災多少任務，要多少時間？多少勞力，挖河多少任務？要多少時間？多少勞力？任務多，力量小，也要完成么！咋辦呢？群眾的辦法多哩！一個群眾一個腦瓜袋，十個群眾十個腦瓜袋，找竅門，挖潛力，啥辦法都出來了。

在使用勞力的時候，還要照顧勞力體力強弱和技術專長，例如有一個姓崔的老頭兒，六、七十歲了，會养猪，如果不叫他喂猪，叫他去挖河，那就不行呀！這不光不能發揮他的技術專長，也不能發揮他的積極性。

如何照顧呢？能挖河的就挖河，能搞副業的搞副業。五十歲以上的老頭兒干啥？積肥么！老頭兒積肥有三大好處：第一、活兒輕一點兒，自由、隨便一點兒，老頭兒一不自由，他就惱了；第二、老頭兒積肥有技術；第三、老人不怕脏不嫌臭。青年人嫌脏嫌臭，不會積極。所以我們的積肥規劃里盡是老頭。

另外，組織一部分機動勞力，機動勞力不固定任務。農業社沒有機動勞力，往往不能實現計劃。為啥呢？比如今天規定社里挖河多少任務？啥時完成？救災多少任務？啥時完成？勞力統統安排進去了，可巧，明天上級來要五十個勞動力修公路，不去吧！是上級分給我們的任務；去吧！我們的計劃怎能完成呀？如果配備了機動勞力，修橋也好，修路也好，有勞力，去吧！這樣，規劃就能保證實現。

我們社的勞力這樣一規劃，大家的勁頭可真大，都反映：“合作化，優越大，會弄啥，就弄啥，心滿意足勁頭大，上山掏虎也不怕。”所以合理使用勞力是個很大的問題，合理使用，勁頭就大，就能發揮積極性；不合理使用，就很難發揮積極性，規劃就不能實現。

再有是幹部規劃問題，開始時，個別幹部對於好做的工作爭着去

做，不好做的工作光朝别人身上推，搞出成绩伸手要，有了缺点互相推，说：“我可没参加意见哪！”这样，就很难全面跃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实行了分工分业定额包干管理的办法。在实行这个办法时，也是根据干部技术专长、能力大小，以及活兒轻、重、难、易进行适当分工，工作是难是易，干部能力是大是小，一定得弄清楚呀！他只能担一百斤，你给他担一千斤，就吃不住哪！

在干部分工分业，固定包干以后，那方面出了问题，就找那方面干部。比如支书是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啥时社员的生产情绪不高，出勤率低了，就是支书负责，为啥呢？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嘛！

这样有任务，有时间，有要求，业业有专职，事事有人管，领导具体，上下不乱，不仅能发挥每个干部的创造性、积极性、钻研性，而且适应各种工作的复杂性。农业社的工作可复杂呀！县人民委员会分七、八个科，县委分好多部，农业社不分科，也不分部，啥事到了农业社就这几个做，不分行，不分业，啥事都要找支书、找社长，那可不行哪！分了行，分了业，谁管啥就管啥，该找谁就找谁。这样，就可以适应多项工作，否则就拉不开趟。

一变二，二变四，扩大再生产

农业社要掌握一定的经济力量，为啥呢？农业社是几千口人、几百户的大家庭，社党支部和社管理委员会好像是个一家之长，对这个家庭里谁有点啥问题，谁有点啥困难，都要能解决，特别是灾区，群众睁开眼睛就有困难，不是缺吃的，就是少喝的，不然就是看病吃药没有钱。面对灾区群众的困难，如果不好好加以解决，就显示不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就不能使社员树立起爱社如家的思想，农业社就不能很

好巩固。社員把牲口、土地交給合作社，是想依靠农业社，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早享幸福生活的呀！你没有給他解决问题，他就不爱社了。比如說：有一个社員的爱人生病了，要化两块錢买藥，沒有錢拿了藥方来找社长，滿心想借两块錢給老婆看病，可是社里經濟力量放下了，沒有錢，社长只有硬着头皮說：“沒有錢，你回去吧！”这个社員滿心难受回家轉，一到家，他一会对他的爱人說：“土地給他了，牲口也給他了，农具也給他了，如果不給他，卖了一头牛，还不是可以給你治病？”这样，你叫社員爱社，他就爱啦？不爱的。为啥不爱呢？你这个社沒有使社員可爱的地方，不能为社員解决困难。反过来农业社掌握一定的經濟力量，社員来借錢給他老婆看病，社长就可以叫會計借給他三块錢，对他說：“两块錢拿去买藥，一块錢买点雞蛋、藕粉給爱人調养調养，治好病，好好生产劳动。”这个社員一听，还能不爱社？为啥会爱呢？因为你这个社确实有社員可爱的地方。你不叫他爱，也不行哪！这样，农业社就成为一个棒打不烂、石砸不碎的坚实組織。

社里掌握經濟力量，主要的目的是：开展副業活动，扩大再生产。我們社里掌握的办法是：根据社員自覺自願的原則，把去年秋季的农业收入，除分給社員每人六斤食粮和半斤棉花外，其余二万八千斤粮食，五千斤棉花，六千八百斤油料作物，二十六万多斤紅薯，二十万斤蘿卜，全部由社里統一掌握起来，統一掌握起来干啥用呢？一部分通过按劳預支安排社員生活，一部分作为原料和資金，扩大了再生产。

我們是怎样扩大再生产的呢？

第一是把紅薯打成粉，去年秋季收紅薯二十六万多斤，和群众說明道理以后，大家一两也沒吃，除留种子两万斤外，其余全打成粉。紅薯打粉，可以解决三大問題。第一、解决粮食問題，紅薯打粉晒渣

以后,吃渣、吃粉面,一斤頂两斤吃。这样,我們全社节约粮食四万斤。第二、增加了社員收入,在不影响吃紅薯渣和粉面的原則下,把紅薯粉欠做成粉条,一共做了三万斤粉条,卖得八千一百元,这八千一百元,可买杂粮十万斤,我們社只缺十万斤粮,所以仅仅拿紅薯粉欠做粉条这一項,就解决了全社社員买粮食缺款的困难。第三、能保证紅薯不烂,过去群众有句話:“紅薯是个宝贝蛋,就是坏起来没办法。”这說明过去保存不好。現在可不同了,不怕坏了,打成粉晒成渣,就可以保存了。

这二十多万斤紅薯,如果分給社員,只能吃四十天到五十天,現在打成粉,吃了二百四十天,所以是扩大再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好办法。这和别的副业生产不同,别的副业生产比如卖蔬菜,是不增加社会财富的。所以它不仅在灾区是个好办法,在非灾区也是一个好办法呀!

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办法是在不影响喂牛的原則下,把牛的飼料打成油。去年我們社一共要四万斤牛飼料,社里只有一万斤黃豆(黃豆在河南是普通的牛飼料),还缺三万斤,这三万斤由国家供給,可是沒錢买,咋办呢?我們就在仅有的一万斤黃豆里想办法,把黃豆扩大再生产,結果一万斤黃豆就解决了四万斤牛飼料的困难。

咋解决的呢?把一万斤黃豆加工成油,一百斤豆能打十一斤油,一万斤豆就出一千一百斤油,一千一百斤油能卖五百来块钱。牲口料哪来呢?拿榨过油的黃豆渣做成豆餅喂牛,比喂豆还頂事哩!在这个基础上,穷人又想了穷办法,把豆餅再扩大生产,做成豆腐,剩下的渣还可喂牛,一斤豆餅出二斤豆腐,一万斤豆餅出两万斤豆腐。这一家伙又扩大了二千元,連油合計在內,共收入二千五百元,这二千五百元,能买三万斤粮食,这就解决了我們社里三万斤牲口粮的困难。

拿牲口粮扩大生产,再解决牲口料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办法。

第三个办法是养社会主义猪,过去我们社没有养猪的习惯,也没有养猪的经验,毛主席号召大家养猪以后,我们就发动社员养猪,发动了很长时间,发动不起来,啥原因呢?社员买不起猪娃,有人买得起,又没啥喂。我们就进行研究,一研究,发现目前如果要大量养猪,必须集中养;分散养,不可能大发展,群众一没有那么多资金,二没有那么多时间。集体养吧!又没有经验。1953年初社养了七十头猪,喂了两个多月,小猪瘦了,上中农光刺激社,走过初级社门口,都笑着说:“合作社的小黑猪变成了小黑猫啦!”有一只猪买来时五十四斤,喂成了四十六斤,到10月头上发生猪瘟的时候,一下死了三十五头,小猪一个也没剩。这主要由于没有集体养猪的经验。这又是一个困难,不集体养猪,不能大量发展,集体养猪,又没有经验。这个矛盾摆到了面前。最后,大家研究出一个过渡的办法,既要养,又要防止死亡。这个办法是:集体经营,分散到户,加工喂养,固定包干。固定包干的具体办法就是:定成本,每头猪由社里投资十元,饲养款五元,定工分,社员给社养一头膘猪三十个劳动日,老母猪七十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的工资,固定一元。为什么固定呢?不固定,就影响社员喂养的积极性了。定任务,每个膘猪毛重一百五十斤,老母猪全年交十五个猪娃,每个十二斤重;定时间,向社里交猪是十二个月交一次,肥料是按三播交清。那三播哪?春、夏、秋三播,一次交三车,一年交九车;定技术,我们社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好作难哪!河南省新乡专区有个农业中等学校,农业中等学校里有畜牧科,这个畜牧科,专门培养学生学习牧畜的技术。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培养了四个技术员,这四个人学习了两个月,回来了,这时,恰好青年队集体养的猪得了病,他们去一瞧,说是猪瘟,经过消毒、隔离、用药、打针,真灵哪!猪立即

停止死亡了，全都吃食了。这一来，群众对他们很拥护，我们就定技术，叫他们四个当老师，以老师带徒弟的办法，组织一批人学了。现在，每五十头猪固定一个技术员，技术不会很高，反正消消毒，打打防疫针还能管用。

现在，我们不光集体养猪，大部分副业生产都是集体搞的，各家各户就是养几只小鸡、小鸭，为啥呢？我们是搞农业集体化，搞社会主义么！就不能走分散道路。光从分散出发，指导思想上有这毛病，就搞不成集体化，搞不成社会主义。比如1956年我们搞副业生产，是收入大、投资大的归社里搞，收入小、投资小的归生产队搞，不便于掌握的零星副业分散给各户搞。书面文章一写，大家都照着办了，一办，问题可多啦！原料、技术、收入不平衡，社员自发势力等等，发生了五个根本性的问题。

如技术问题，社里搞副业，必须向队里抽技术、抽劳力、抽工具，可是，队里不讓抽，说是：兴队里搞么！我们也要搞了。这样，社里就搞不起来副业了。

队里呢？这个队有技术、有原料、有工具，就搞得好些；那个队没技术，没原料，就搞不起来。这样，搞得好的队收入多，人吃牛喂用罢以后，还有余存，搞得不好的队不但没余，还要赔，收入不平衡，这就有问题了。再下去到各家各户，情况又变了，副业搞得好的队，光搞副业，参加社的农业生产就少了，麦罢收入就少，形成夏荒啦！副业搞得不好的队，力量放在搞农业上，麦罢收入就多。这样，收入又不平衡了，这都是问题呀！

另一点，副业下放到户，社员有了自发趋势的力量，合作社就不能巩固啦！农业社工作，不管啥时候，都必须集体搞，集体搞能搞得更好，能显示出合作化的优越性，如果各人去搞自己的一套，一天收

入一块，在社搞一天收入五角，那他还肯在社么？农业社就不能巩固啦！

我們一个邻社，1956年副业一下下放到户，各人救各人的灾，各人搞各人的副业，社长、支書沒事干啦！一商量，說：“咱俩人去搞咱俩人的去吧！”結果，副业搞得真好，可是劳力都搞副业啦，麦子沒加强管理，一亩管四十来斤收，秋后一淹，好啦！一个劳动日才分一角七分錢。咋办呢？社长、支書发动大家搞水利，弄农业，可是，社員說：“我还是搞我的副业吧！在社搞，一天只弄一角七！”那社就不巩固了，这是教訓哪！

农业社搞副业，該由社集体搞，增加了收入，还是分給社員的么！社員既不麻煩，又能增加收入，我們社的社員現在都不願分散搞，拥护集体搞啦！

按劳預支办法好，就怕自己劳动少

統一使用，按劳預支，这是农业社的分配办法，主要是把所有經济力量，統一使用，通过生产，解决社員生活。

灾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特別大，困难不解决，就要影响生产，同时扩大再生产，取得收入以后，如何把收入分配好，既能全面解决社員生活困难，又能满足生产建設的需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在解决这个問題上，我們摸索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按劳預支，全面安排生产和生活。具体办法是进行三查三算，查灾情，算生产投資和社員生活需要；查各項生产任务，算各項任务需要多少工；查現有經济力量，算今后可靠的收入。通过三查三算，按照需要和可能，确定劳动預支标准。随着形势的变化，二年来我們的預支办法也不断改

进，說起来，大約采取了三种形式：一种是按劳統一平均預支，就是一个劳动日平均几角錢，不管各戶困难大小，一律按照統一的劳动日进行預支，計算劳动日預支标准的公式是：社內用于社員生活上的經濟力量除麦收前預計做工数就是劳动日預支标准。这个办法执行了一个时期以后，好处是能調动一切积极因素，缺点是投下的錢过大，劳力多的戶預支用不完，劳力少的戶又不够用，形成了資金的浪費，削弱了生产投資。如果社里經濟力量富裕，采取这个平均預支办法还可以，可是1957年社遭灾了，經濟力量不大，这办法就不行了，后来就改进了。改成按劳分类預支，把社里二百多戶，根据生活困难大小，劳力强弱，分成三种类型。再在三种类型戶当中，抽出一戶有代表性的确定典型戶，先給他定工，看他这一戶一天能劳动多少劳动日？再确定生活需要标准，看他一天需要多少錢？拿他的定工数去除需要数，得出来的数就是預支标准数。这个預支标准数就是他这一类型戶的預支标准数。这个办法执行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发现了問題，啥問題呢？类型戶和类型戶之間的界限划不清，劳力多、人口少的戶还是用不了，有些劳力少、人口多的戶还是不能解決問題，这办法又不行了，我們又发动大伙兒鑽研，大家一鑽研，又鑽出一个办法，根据各戶生活需要和可能做的劳动日数，确定各戶的預支标准。算法就是根据这戶的生活需要减去他的度荒潜力，除他的定工数，所得出的数就是預支标准数。一戶一个預支标准，二百零四戶，二百零四个預支标准，戶戶都解决了問題，而且避免了浪費。这个办法对灾区最适用。

二年当中，我們采取了这三种形式，感到第一和第三种較好，第一种适合于非灾区，灾区經濟力量不足，采取第三种办法好。

在預支時間上，我們在1956年是一个月預支一次，結果，社員嫌